

金羊文集 / 金羊文集 / 金羊文集 / 金羊文集 / 金羊文集 / 金羊文集

香港当代小说概述

何 慧 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

香港当代小说概述

(1949—1996 年)

何 慧 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

责任编辑:戈晓宇

责任技编:梁碧华

封面设计:小 粟

封面摄影:顾今明

金羊文集(共 10 册)

香港当代小说概述

*

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华南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厂址: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校园内)

889×1194 毫米 32 开本 60 印张 110,000 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套

ISBN 7—80632—042—3/I·5

全套定价:1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以“大陆文化回顾”为主流的五十年代	
香港小说	(12)
第一节 社会政治小说	(12)
一、当时的立场——壁垒分明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功能	
二、现时的观察——小说中的合理成分	
三、变化中的时代评判——人性和优秀的文化传统永存	
第二节 回忆爱情,寄托乡愁	(21)
一、战乱后的迷惘	
二、放逐的情怀	
三、专注内心,迷恋爱情	
第三节 现代主义的萌发	(33)
一、五十年代香港的现代主义运动	
二、消解政治意义	
三、质问本我是什么	
四、昆南的《地的门》	

第二章 向流行文学倾斜的六十年代香港

小说 (44)

第一节 现代主义的显著收获

——刘以鬯的实验小说 (45)

一、技巧即观念的理论

二、病态的社会

三、扭曲的人性

四、一本关于香港文学的小说

五、《酒徒》的技巧

六、情节与意识流的统一

七、刘以鬯其他小说的创新

第二节 唯美主义的成功实践——徐訏的小说创作 (59)

一、思想发展的轨迹

二、唯美主义的倾向

三、在想像中实现宇宙的和谐

四、徐訏小说中的放逐倾向

五、艺术特色

第三节 现实主义的再出发 (72)

一、以理想观照现实——夏易和阮朗的社会关怀

二、现实主义的本土化——侣伦和舒巷城的香港意识

第四节 流行小说的崛起 (99)

一、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二、两种态度以外的第三种态度

三、流行小说的几种功能

四、汪洋大海般的流行小说

五、以促销报纸为目的的流行小说：梁羽生与金庸

第三章 “大陆文化向往”和“海洋文化向

往”的双向选择 (122)

第一节 现代主义的日益成熟 (122)

一、直接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经验

二、多种艺术态度构成的后现代特质

三、以更为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世界

四、魔幻主义和儿童愉悦的糅合——西西的艺术趣味

五、纠缠不休的东方与西方——夹缝中的也斯

六、追索原始——吴昊斌的探索

第二节 现实主义的北望与南归 (158)

一、拯救社会和自我的小说创作

——海辛、金依、张君默、陈浩泉的北望倾向

二、从社会批判到社会认同

——东瑞、陶然、白洛、颜纯钧的南归倾向

第三节 流行小说的标新意识 (193)

一、历史的艺术化展现

——高旅、董千里、南宫搏、金东方的不同视角观照

二、古代服装，现代内容

——温瑞安当代都市武侠小说

三、科幻小说的走红——倪匡另辟蹊径

四、高雄的“三苏怪论”

五、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的爱情梦想

——严沁和岑凯伦的小说创作

第四章 沉浸在自由资本主义既得利益中的

八十年代香港小说 (213)

第一节 女性意识的觉醒 (213)

一、大胆的女性性意识探索——钟玲的开风气之先

二、对女性性别的尴尬——陈宝珍笔下女性的苦难历程

三、失落的爱情——钟晓阳的幻灭情绪

四、公开肯定婚外恋情——施叔青直面内心

五、畸形恋情的大曝光——李碧华深入不为人知的角落

第二节 流行文学的媚俗倾向 (248)

一、与传统背道而驰

二、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以及变化了的性观念

三、包装、有型——气质的凝造

泼辣的都市女性——亦舒

雅典的西洋淑女——林燕妮

开放的女大学生——西茜凤

第三节 消解意义

——也斯《布拉格的明信片》的后现代实践 (262)

第四节 九七情结 (274)

一、刘以鬯的《岛和大陆》，陶然的《天平》，白洛的《福地》，
巴桐的《雾》

二、梁锡华的《头上一片云》及其小说创作

第五节 香港的大陆题材小说 (286)

一、金兆的伤痕文学

二、陈娟的传奇

第五章 以“回归”为主旋律的九十年代香港

小说 (291)

第一节 港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291)

第二节 新南来作家群的积极参与 (300)

第三节 梁凤仪现象 (303)

一、以商业手段行销文学作品

二、爱国主义情绪

三、女性对爱情的决断与柔情

四、男人是第二性

五、事业是女性的生命

香港当代小说概述

(绪 论)

与大陆意识形态一致性极强的文坛相异,香港文坛是一片自然丛林。这里政治荫蔽下的姹紫嫣红生长得并不繁盛,延绵不绝的是扎根于民间的奇花异草。它们俯首低微于大众的文化品味,并以民众的养育作为自己的生命源泉,屈强地生长出与大陆文坛迥异的文学作品。

香港作家群是一支极其勤奋的队伍,他们以极快的写作速度,极鲜明的个性特点散枝开叶,以不同的整体风格屹立于中国文坛。

—

半个世纪以来,独立发展于自由资本主义殖民地的香港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至少可以综合成三点:

第一,这片言论自由的土地保留了与大陆主流文化相异的另一种观察世事的视角,弥补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某些空白。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学从深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自主,成了党的同盟,变成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充满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作品。“五四”以来所开创的文学的优良传统——批判现实的功能和启蒙的功能转移到香港作家的创作中。香港作家夏易、阮朗、侣伦、舒巷城的作品就以理

想的尺度,烛照出香港社会的黑暗。此外,香港文坛还容纳了像张爱玲和徐訏这样一些被革命阵营视为异端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政治对垒相对减弱的今天,更显示了不灭的社会价值和人性价值,张爱玲的一些作品很严肃地向我们提出了法治的问题,徐訏的作品则向我们显示了一个雍容大度,平衡和谐的世界。

第二,香港文学的偏大众化特点和偏民间性特点与大陆文学的精英特点、教化特点形成鲜明对照,满足了读者不同的审美趣味,为文学如何争取读者提供了经验。人的思想意识和传媒的影响密切相关,读者在不加思索地享用别人的思想成果的时候,实际上也接受了反复重述过或被汰选过的经验。根植于香港民间的流行文学更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总是追求新的艺术趣味,继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之后,又出现了历史小说和科幻小说,更有一些作家以“怪论”的形式,说出了自己对香港社会的新感受。在取悦读者方面,香港文化商人也作出了许多新的尝试,先是搞报纸的促销,然后是推出不同包装的小说明星,制造出无数个“他性”来,以证明今非昔比。最后是以生产商品的方式来经营文学,以便获取更大的名利双丰收。

第三,现代化、国际化、都市化把香港文学推向前卫,小说的语言文字和体裁形式都有了创新,小说的内容更是表现出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激荡和生活形态的变迁,向大陆文坛展示了崭新的精神与活力。50年代,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就已经开始从人本的角度反观政治与经济,出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作品,60年代刘以鬯等人的创作更是以“技巧即观念”的姿态表现出不向流俗低头的美学力量。以后西西、也斯等人不断探索新的形式为都市化的香港塑形,创作了一批面貌全新的小说。90年代,也斯的《布拉格的明信片》很好地实践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主张。

由于香港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明显,香港作家总能按照自己

的艺术趣味,实践自己的艺术主张,香港文坛可谓风采纷呈。

二

香港处在大陆和西方的交接地,一直以来就受着双重文化的影响,香港文学是一种边缘性的文学,这种文学有着融汇各种思潮的特点,就实际的创作主流方向而言,半个世纪以来的香港文坛,大致可以分作几个阶段。

50年代以“大陆文化的回顾”为主流。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香港与祖国的关系开始处于相对隔离状态,香港文学也走上了自立发展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性盛事也影响了香港,香港出现了工人罢工,政治骚乱等事件,港英当局面对这一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通过和公布了多项法令和条例,这些法令和条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香港政府对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抵制态度。这样的政治背景,大致确定了当时香港作家的阵容。正如黄维梁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之后,大量左派作家返回大陆,很多非左派作家则离开大陆,到了香港、台湾和海外。50年代香港,成了逃亡作家的庇护所。”(黄维梁《香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原载《香港文学》1989年)这批南迁作家的到来,为沉寂的香港文坛的复苏贮存了巨大的力量。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开始改变对华政策,由消极的静观到积极部署,台湾在香港的活动亦慢慢活跃起来。他们建立基金会和文化组织,资助部分出版社,以高稿酬买稿。一批南下作家趁机抒发战乱后内心的创痛,作品洋溢着怀乡之情,忧国之思,题材多为对故国山河的眷念,战乱流离的飘泊,与抗战前后人物事迹的描述。

同样在这个时期,另一股政治势力不想美元文化占尽上风,北京方面开始在香港做文化工作,他们创办了一些有规律的文艺期刊,也培养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

50年代的香港文坛,是个政治壁垒分明的场所,不同政治观点的作家所打的政治仗以小说的形式来展开,各为其依附的政治权力服务。文学靠非文学的因素来支持,这在中国历史上早有先例:先秦散文、汉赋、魏晋时代的文艺理论,南北朝华艳淫靡的作品,以及以后依靠科举制发达起来的散文、诗歌,无一例外,都和“御用”有关。在针锋相对的政治气氛中,要打赢文化领域的政治仗,先定现实的再现有时会替代了模仿生活的古典主义原则。然而,当作家透过自己的头脑,“再次呈现”生活的时候,作家会被许多政治观点以外的因素所左右,作品虽然依照观点而成,但浩瀚的生活决不是狭隘的政治观点所能包容,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有政治观点的作品中,读出了超越狭隘党派偏见的更为丰富的内容。尤其是作家把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遗产当作文学创作时驱遣陶熔的资料,他们的创作就必然表现出合理的审美成份。

在南下作家沉迷于政治、怀乡、爱情的时候,香港一批较年青的作家创办了《文艺新潮》,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在香港生根。

60年代是香港流行文学的萌发期。随着美元文化的撤退,香港文坛上的喧哗逐渐沉寂,处于从怀念乡情转向面对现实的低温期。1956年10月10日,香港爆发了政治暴动,直接打击了香港市民的生活,香港作家的政治热情开始减弱,由于香港政府在文化建设方面毫无建树,香港文学有着向民间发展的倾向。作家们的写作速度开始加快,作品思想容量开始减少,流行成分开始加强。也就在此时,梁羽生、金庸等人为促销报纸开始了武侠小说创作的尝试,大获成功。依达的新派流行言情小说也取

代了杰克(黄天石)、望云(张吻水)的旧式鸳鸯蝴蝶派小说。三苏针贬时弊的怪论也大受香港市民的欢迎。

在国外,流行小说一直被视为满足低层次文化需要的较次等的文体。五、六十年代后越来越盛行的香港流行小说似乎打破了这一说法。这不仅仅是因为香港的阶级文化冲突不如欧美明显,没有真正的文化主导力量去鼓励人们读高雅的文学作品,更在于香港是个鼓励流行小说创作的地方,从事流行小说创作的都是些较高层次的文化人,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生产和消费是它主要的运转环节。香港文化因此也就主要是消费文化、流行文化、俗文化,它首先以迁就广大消费者的需要为目的,受消费者的审美趣味所控制,只有这样,文化商人才能获利。为了按经济规律办事,香港文化人作出了妥协。

也就在此时,一些不甘随俗的作家,高举着现代主义的大旗,对流行文学作出了不屈的抵抗。他们创办了《好望角》杂志。刘以鬯也在此时出版了他极具艺术技巧创新的《酒徒》,以意识流的手法,道出了香港文化人的悲哀。

70年代,香港小说表现出“大陆文化向往”和“海洋文化向往”的双向选择,60、70年代,香港逐渐摆脱了经济上的窘境,获得了初步的繁荣。社会逐渐走向富裕,生活秩序也得到了恢复。50年代作家笔下那种“本来是五湖四海的英雄,而今宝刀只能当作白铁买”,以及原来的名门闺秀只能在欢场中操皮肉生意的状况已经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个人决断性较强的对不同生存方式的自由选择。基本生活有保障,使得富人和穷人这一对立阶级处于劣势一方的穷人,在处理阶级矛盾时,也不采取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态度。一种本阶级优越的自信自始至终存在于出身于下层劳动人民的作家的作品中,并且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70年代的香港,处于西化不断加深,同时大陆的影响也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一方面是西方意识形态甚得香港年青一代的接受和仰慕。外国电影开始在香港抬头,披头文化也乘势卷进香港,这种新的文化潮流孕育了香港年青人共同的思想观念及价值模式,模糊了原有的阶级和传统规范。在文化领域内,阶级等分被削平了,民主化作为一种文化潮流,开始不为某一特权阶级所垄断而广及社会大众。另一方面,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也因被误解为民主化与反传统和某些西方观念吻合,而扩大了大陆的影响力。陈宝珠与萧芳芳主演的“泛工厂妹主义”粤语片被广泛接受,就证明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潮流,被社会广泛承认。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崛起了海辛、金依、张君默、陈浩泉等一批“打工仔”出身的作家,他们以工厂、渔村、小镇生活的纯朴古风,对抗资本主义生活的厚颜无耻,伪善行为、冷酷无情、斤斤计较、利欲熏心,追求虚荣。

与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北望倾向不同,西化教育、留洋热潮、大量译介西方文学作品与理论,也培养了一批香港现代主义作家。如西西、也斯、吴煦斌等,他们作品的体裁形式,主题笔触,表现方式等,均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强烈影响。

80年代的香港小说创作有着更强烈的沉浸在自由资本主义既得利益中的特点。一方面是流行作家们清晰而明确地肯定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性解放的观念。在香港,由于没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个人主义更加地甚嚣尘上。这种新型的人格,要求人们在庞大的政治和经济运作之下,明确而清晰地自觉到自己需要什么,从而毫不畏惧地表达出来。大众文化恰巧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毫不犹豫地结合在一起,鼓吹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以挽救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于是资本家制造的潮流像一个不可侵犯的权威,无形

地引导着大众的消费取向。个人品味及价值判断被纳入到一种共同化的趣味中。潮流的周期性变换经广告信息的宣传,变成了一种近乎铁定的生命规律,大众只能宿命地接受这客观的现实,不然便会与时代和大众脱节,被孤独及虚无的恐惧所困扰。于是我们看到那些身着名牌周旋于上流社会中的人们,也许有一个很不光彩的过去,然而不要紧,金钱操纵的人伦关系使“英雄莫问出处”成了可能。流行小说中极尽铺陈的奢华,成了人们生活的范本,那些常做白日梦的人们难免受骗上当,成了确保大规模生产产品销路的承受者。拜金主义、强者人格、开放的性观念及有品味地生活构成了香港此一时期的流行小说的主旋律。而亦舒、林燕妮、西茜凤等人的作品无疑最典范地反映了这一点。他们不仅迎合潮流,而且有计划地把自己包装成符合潮流的人物,目的是整理出一个过去的“他性”来,方便出版商或某个利益集团塑造出一个个流行小说明星的神话。

另一方面,一批新移民作家完成了从社会批判到社会认同的过程。大凡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回到香港,都会感到思想观念上存在的极大落差。70年代初从大陆到香港的作家,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看到了中国因政治制度不完善造成的种种恶果,但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经济平等,人格平等,精神第一的产物。这批在海外出生,回大陆受教育,又返回香港的作家,一旦离开了原来熟悉的环境,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不但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便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及文化心理的撞击和振荡。他们首先经历的是失落:理想的失落,精神的和情感的失落,事业和信念的失落。继而,他们会在失落中寻找,重新建立新的人伦关系和道德观念。这批作家的早期作品,都带着明显的大陆烙印,对香港社会因看不惯而愤怒,因愤怒而有所批判。他们的中期作品大多诉

说伸张人格和顺从生活的两难。他们的后期作品把视角调得更超脱,以冷静的、旁观者的身份叙述社会的丑恶现象。他们一改以往南下作家不认同工商社会的“士大夫”特点,沉浸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既得利益之中,并成为社会的弄潮儿。东瑞、陶然、白洛、颜纯钧是这批作家中的代表人物。

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职业女性的增多,原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关系受到了冲击,性即政治,不少女作家以自己的小说创作对原有的社会秩序进行了颠覆。

个性极强,风格各异的小说创作蔚为大观形成了香港小说多元化的后现代特点。

90年代,香港文坛在自我省视的同时,也高奏回归的凯歌。1982年年底起,香港进入了一个历史转变期,1984年9月中英两国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意味着香港前途的转变。两国签定条约,这是政治问题,然而600万香港人几十年来已经被物质形态固定了的生活方式由此将会改变,这就有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从“前九七”的恐慌、混乱到面对现实,再到“后九七”发现回归大陆的价值,并积极行动,香港人走过了从游移到坚定的过程,香港的小说创作也记录了这一过程。与关注回归相并行,香港人开始有意识地流露出对过往共同经历的缅怀,希望为香港将来的独立自主提供经验与保障,一批追索香港历史的作品也由此产生。

“梁凤仪现象”出现标志着流行文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梁凤仪是以全新的姿态闯入文坛的商人。她的整个写书、成书、行销书籍的方式,都不是作家式而是商人式的。80、90年代的香港,作家早已失去了神圣的身分,所有有新闻价值的人全都有成为作家的可能,他们以开专栏的形式挤进了作家的行列,象梁凤仪这样亦商亦文似乎更能成为这个时代作家身份的标记。写书

发财的金庸,是一种正面的借鉴,他们的无意插柳,引发了梁凤仪的有心栽花,梁凤仪以排炮式的出书方式进攻书籍市场,创造了文化界的奇迹。“梁凤仪现象”是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它把精神生产和工业产品的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更为低本、更易获利、更有把握的生意。经济是生活,文学是情趣,把经济与文学,生活与情趣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者,唯梁凤仪一人。从作品的思想内容看,梁凤仪的小说并非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认同者,相反,深知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同情弱者,张扬独立自主的人格,都消解了资本主义的流行观念,并与资本主义构成一种潜在的对抗。

三

与香港文学的纵向发展相伴随的是香港文学的边缘性,都市化和民间性特点。

说香港文学是痛苦的精神放逐并不为过,从香港沦为殖民地开始,尤其是1949年到1997年这段时间,香港的文化一直处在模棱两可的尴尬地位,身受港英政府统治,北望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台湾,身受多重文化的冲击。他们在语言文化上有所认同,却摆脱不了殖民地的特色。表面上很开放,很自由,实际上港英政府并不愿意在文化建设上付出更大的努力。在这个创作似乎很自由的空间,作家们常常感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撕裂。不同背景,不同出身,受不同教育的作家,都说着依附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故事,然而,他们却不生活在那种意识形态的环境中,对自己身分和认同的不协调,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心理矛盾,也造成了香港小说的不同流派。多元化却缺乏统一的文化精神是香港小说的一大特色。“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稍留……向北风而开襟”,这